

現階段中共的華僑政策與僑務工作

吳春熙

一 中共對華僑問題的基本態度

華人移殖海外，歷史悠久，分佈遍及全球，為數達二千二百萬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散處亞洲各國，以東南亞為主要移民地區①。由於血緣、地緣、傳統文化和經濟結構等因素，構成獨特的「華人社會」，西方學者稱它為「社會中的社會」。二次大戰後，東南亞政治環境改變，新興獨立國家民族主義意識高昂，對外來民族採取歧視和排斥的政策，首當其衝者則為此一地區的華僑和華裔，成為一個客觀存在的複雜問題。中共的僑務，依其工作目標和任務的不同，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為其針對華人知識份子政治鬥爭的主要據點，而將全面僑務重心安置在東南亞地區，由於香港為海外華僑經濟的軸心，便成為北平對華僑社會統戰工作的指揮根據地。

根據一九七五年五月號「中國大陸」雜誌揭露，毛澤東曾經在其對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說：「海外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二生命，而華僑為其第二生命的組成部份」②。中共「重視」華僑問題乃純粹從價值觀為其出發點。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二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說：「北平的政策在爭取多數華僑的支持，來提高其國際地位和改變政治形勢的奮鬥」。一九七三年蘇聯國際關係研究所M. A. Andreev 在其「海外資產階級——北平東南亞的工具」論著中明白指出：「北平將其政治計劃寄託在中國的海外華僑的身上，包括其中的資產階級，指望經由他們來執行北平的東南亞政策，因此華僑成為當前北平領導階層預東南亞未來發展陰謀的重要工具」③。西方學者通常的看法，亦認為「海外華僑為中共南侵政策的潛在基石和先鋒」④。莫斯科片面的觀察和「指責」，顯然是基於毛俄政治鬥爭不同的立場，事實上中共對華僑

的統戰陰謀是多目標的，包括政治的、外交的和經濟的。

「階級鬥爭」為中共黨的發展不變路線，毛共一向認定長久僑居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華僑，包括在大陸的僑眷，其階級成份，絕大多數都是資產階級、地主和富農，是階級的敵人和被鬥爭的對象。一九五〇年「土改」時期，百分之九十的大陸僑眷被列入「華僑地主」和「地主華僑」，受清算鬥爭，一九五一年中共南方局書記鄧子恢曾公開指示對待這些僑眷要採取嚴厲的鬥爭手段⑤。當時廣東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伍治之承認鬥爭華僑的事實⑥。「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大陸僑眷不斷受嚴酷的迫害，這就充份的說明了中央對華僑基本上採取敵視的態度。

另一方面，中共為了「革命的利益」，和利用華僑作推動革命輸出的賭注，在統戰策略運用觀點着眼，現階段華僑仍然有其利用的價值，至少華僑不盡是今天的敵人，可能是明天或後天的敵人，因此不得不承認下列客觀存在的事實：

(一) 在歷史上華僑的政治取向，直接間接影響中國的政治；在經濟上華僑匯款對中國彌補國際收支的貢獻。

(二) 華僑社會除新加坡外，在僑居國家雖然是少數民族，但在經濟上具有雄厚的潛力，因此對僑居國家處理「中國問題」的政治立場，無形中有相當的影響力。

(三) 維護傳統文化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屹立和壯大，使中共如芒在背，不得不對其各級幹部大聲疾呼：「對海外華僑如果我們不爭取，臺灣就爭取」，因此華僑問題便成為中共政治鬥爭一個重要環節。

註①根據僑務委員會民國六十四年僑務統計，全世界華僑人口22,025,482人，亞洲地區20,758,728人，佔94.2%。

②盧元邦，「共匪強化僑務工作的陰謀與策略」，中國大陸，第九十三期（臺北，民國六十四年，五月），一七頁。

③M.A. Andrev, 海外的中國資產階級——北平在東南亞的工具，蘇俄報刊輯要第七五期，根據俄文本選載，（臺北，匪俄問題研究中心，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八頁。

④同註③蘇俄報刊輯要，第七六期，六頁。

⑤Chung-shi Wu, *Dollars, Dependents and Dogma-Overses*

Chinese Remittances to Communist China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1967), p. 41.

⑥同註⑤P. 202

二 多目標的「僑務政策」

中共的「僑務政策」本質上是中共社會主義政策的一部份，具體的說：

(一)對大陸僑區——加緊對僑眷，歸僑和僑生的「思想改造」和管制，要求和廣大羣衆「一視同仁」，服從無產階級的領導，爲「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服務。

(二)對海外華僑社會——擴大所謂「愛國華僑統一戰線」，要求海外華僑在政治、外交和經濟上全面的支持，其當前最首要的政策任務是兩面的：(1)一方面爲了適應僑居國家的政治環境，消除爭取外交關係的阻力，要求華僑與當地民族打成一片，尊重當地政府的法律與秩序；(2)另一方面爲了長遠的「革命利益」，要求海外華僑要與當地「人民革命」相結合，投入「民族解放運動」，全力支持僑居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前者祇是手段，後者才是真正的目標。

中共的外交和僑務是一體的兩面，僑務工作循着外交路線推動，這便是「僑務服從外交」的政策。「九大」結束後不到半年，北平開始着手外交的政策技術性的調整，僑務政策也緊跟着從策略上的修正。一九七一年以後，「尼克森主義」大行其道，世界戰略由「冷戰」轉向「冷和」，新的形勢便利毛澤東的所謂「革命外交路線」在國際社會插手，一九七二年尼克森北平之行，周恩來公開承認這是替中共打開通往國際社會大門的一着棋⑦，使

中共得以解脫長期國際孤立的窘境，因而得到實現其向東南亞擴展陰謀的新機會。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來在「十大」的外交報告中，提出締建「國際統一戰線」，着手組織散漫的第三世界，妄圖建立以中共爲中心的世界權力，來與美蘇抗衡，東南亞便成爲中共首先攫奪的目標。

對中共的「革命輸出」，東南亞具備相當「優越」的條件，第一，北平運用「民族解放運動」的號召，正迎合脫離殖民地新興獨立國家強烈民族主義的要求，和提高國際地位的願望，極容易引向對外「反帝」對內「反封建」的鬥爭；第二，在東南亞的多元民族複合社會（Plural Society）中，多數地區雖然華僑是少數民族（Minority）但其根深蒂固的傳統社會組織和經濟地位，成爲不容忽視的力量M.A. Andrev。說華僑雄厚的力量是一支獨一無二的槓桿，中共用它來操縱本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⑧。現階段中共運用「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正巧妙的抱「正常外交」和「革命輸出」安排平行的發展，爲了達成外交的任務，儘量避免接觸敏感的華僑問題，這種「謹慎」的表現，便是僑務工作有一個時期呈現低潮狀態的主要原因，但並不是北平放棄利用華僑這一着棋，而是運用另一種形態和華僑的結合。

一九七四年五月馬來西亞承認中共，一九七五年夏間菲律賓和泰國先後跟進，這些國家的政治領袖正期待經由「關係正常化」，中共對其內部顛覆活動的收斂和抑制，他們相信北平的「承諾」，但缺乏對共產國家外交詞彙政治含義的深入了解，北平「保證」根據「和平五原則」不干預內政，但並沒有「保證」放棄「革命輸出」。一九七五年初夏中南半島淪陷，不到一個月中中共外交部長喬冠華在天津的談話，便暴露猙獰的面目，他說：「支持民族民主革命是責無旁貸的國際主義義務……除了精神和道義上的支持，還要物質上的援助」⑨。喬冠華對「革命輸出」的狡辯和遁詞是這樣的：「馬共也好，其他共產黨也好，他們革命鬥爭我們會一如既往支持到他們勝利爲止。……只要我們沒有派兵去侵略別國，就不存在「革命輸出問題」⑩。鼓勵華僑投入僑居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爲中共「革命輸出」的策略之一，喬冠華說：「華僑由於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和影響，毅然參加到革命行列，拿起槍桿子參加當地革命武裝鬥爭，我們也不怕人家說」⑪。註⑦一九七二年一月五日倫敦星期泰晤士報——引用「周總理對外國報界人士的談話」。

⑧ M. A. Andrev，見註③，第七六期，八頁。

⑨ 喬冠華六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在天津發表「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及對外政策的講話」，（臺北，從喬匪講話看毛共當前對外策略，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三二頁。

⑩ 同註⑨，三三頁。

⑪ 同註⑨，四二頁。

三 僑務工作及其策略

二十多年來中共的僑務工作，經常游移於管制或鬆或緊的矛盾狀態，中共認為華僑長久僑居國外，其生活方式和習慣受資本主義社會所影響，充滿資產階級意識和傾向「個人主義」的偏差，無法適應農村改革種種重大的政治運動以及都市社會主義和民主改造^⑫。但為爭取華僑的支持，不得不遷就事實，有一個時期甚至不惜部份破壞既定的統治政策和「政府法令」，給予僑眷和歸僑所謂「適當照顧」和「特別優待」，享受高於一般農民的生活水準，以致引起僑區農民羣衆對華僑的敵視，經常發生嚴重的衝突^⑬。另一方面中共爲了貫徹「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把僑務的重點工作排在僑區的「思想改造」，呼籲「一視同仁」要求僑眷加入羣衆行列，參加各種改造和階級鬥爭^⑭。

「文革」期間所謂「適當照顧」僑眷的措施，經過一陣暴風雨的鬥爭，便蕩然無存^⑮。「紅衛兵」判定大陸僑眷都是「資產階級的餘毒」、「社會寄生蟲」、「不勞而食的剝削階級」和「靠資本主義走狗救濟生活」，必須發動「社會主義教育」和「三大革命運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經驗」——來改變他們的面貌^⑯。跟着採取一系列的行動，包括重新調查華僑的背景，禁止僑眷和歸僑行動自由，管制僑匯和生活費用，一部份僑眷被控告爲「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加以清算。「文革」期間僑區所遭受的殘酷迫害程度，已超過一九五〇年至五三年最黑暗的時期，將歷史推回至一八五八年以前中國政府實施「海禁」政策，鄙棄華僑的時代^⑰。

一九七二年九月間毛澤東提出所謂「內緊、外鬆、紮根」的「六字批示

」，作爲僑務工作的策略原則，接着中共黨中央又頒發一項有關僑務方針的「指示」，聲稱：「做好僑務工作是當前貫徹毛澤東『革命外交路線』的主要內容之一」，要求各級幹部「全力做好僑務工作，通過一個人，爭取一大片」^⑱。根據上項「指示」，中共於同年十一月廿八日至十二月七日在廣州舉行「文革」以後首次的「僑務會議」，提出「鞏固和擴大愛國華僑統一戰線」，作爲當前僑務工作總的路線。

爲衆所知，龐大的僑務機構和華僑雙重國籍問題，往往成爲延滯北平爭取東南亞國家外交關係的阻力。中共首先根據一九六七年毛澤東的指示：「所有對事務均應併入外交部」^⑲，遂於一九七〇年初撤銷國務院所轄的「華僑事務委員會」，將責權和業務併入「外交部」，這不過是行政系統的轉移，事實上中央以及地方各級僑務機構，並沒有多大的變更，中共黨的僑務指揮系統，包括「海外工作部」、「宣傳部」和「統戰部」，以及負有實際執行海外統戰任務的「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和地方各級「歸僑聯誼會」，工作活動更爲積極。

華僑社會結構的變遷和政治環境的改變，二次大戰後大部份華僑自然的取得僑居國家的公民權或被迫歸化，由於各國國籍法規不同，因此發生雙重國籍問題。北平爲顧及外交上的現實利益，迫切呼籲華僑與當地民族結合，取消雙重國籍澄清華僑地位，周恩來首先於一九五五年四月與印尼外交部長史納利奧在萬隆簽訂印尼華僑國籍條約，一九五六年十月與新加坡前首席部長大衛·馬歇爾會談承認華人公民權，此後於一九七四年五月，一九七五年夏間先後對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承諾取消華僑雙重國籍。其後果造成數千萬持用中華民國護照的華僑，因外交關係的斷絕，變成徬徨失措的「無國籍外僑」，失去行動的自由，這種情形最初見於印尼，現在發生於馬來西亞^⑳，不久的將來可能發生於菲律賓和泰國。

北平頒佈新的辦法，規定持用外國護照的華僑必須視同外僑身份，申請入境簽證，同受對待外僑的管制。中共處理華僑國籍問題真正的目的，喬冠華曾露骨的說：「華僑歸化，放棄中國國籍，從長遠的革命利益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所謂「只有好處」，照喬冠華的「邏輯」和所下的註釋是：「華僑既然入你們的國籍，當然有權爲解決你們國家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參加當地革命，這有什麼錯」^㉑，這便就是中共急於處理華僑國籍問題的真正

意圖。

廣州「僑務會議」以後中共的僑務方針已有廣大的改變，比較突出的幾項措施包括：

(一)根據「內緊」的指示原則，一向被認為「思想覺悟不高」，對「社會主義認識不足」的僑眷，和受「落葉歸根」的「封建思想」所影響的歸僑，以及受「資本主義社會」所感染的回國觀光和探親的華僑，這種「份子」對「無產階級專政」不但不會有好感，而且具有嚴重的破壞性，必須恢復全面的監視和管制，規定就他們的階級成份和職業，區分為「一般華僑」或「特殊份子」兩類，分別由「統戰部」與「公安部」嚴格管制。

(二)一九七二年以後中共逐步放寬華僑出入境的限制，各地區在執行上寬嚴不盡一致，但有一個共同的「準則」，即所謂「五准」、「五不准」，規定准予出境的僑眷限於(1)原僑居地有入境簽證的僑生，(2)國外有直系親屬者，(3)「思想落後」無法「改造」份子，(4)海外親屬為中共所爭取的對象之僑眷，(5)老弱女眷「留之無益者」。所謂「五不准」包括(1)被列管的「黑五類」，(2)鄉鎮級以上的現職幹部，(3)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高級知識份子，(4)海外無直系親屬者，(5)「歷史複雜」的僑眷。

中共在海外華僑社會大力宣傳「來，歡迎。去，歡送」的「外鬆」政策，隱含着統戰的陰謀，主要為擴大對外宣傳，中共認為華僑本身就是宣傳的對象，同時也是最理想的間接宣傳媒介。一九七三年中共策動海外知識份子「回歸」、「認同」，有一個時期，從日本、美國、加拿大、香港和東南亞引進了一批又一批的「熱心份子」，但當他們離開大陸後，僅僅留下一份「故土情深」的感情而外，對中共暴虐的統治和他們親友的被迫害留下永難磨滅的憤慨。一部份知識份子言不由衷的發表「觀感」和「報導」，不但是中共所期許的，甚至也被中共所鄙棄。北平的「放寬入境」，極具彈性和間歇性，當大陸發生「批鬥」或動亂，例如杭州，武漢各地掀起罷工潮，最近天安門的羣衆抗暴行動，所有申請入境立刻被擱置，大陸的邊境重新垂下竹幕。

(三)「有計劃」、「有組織」、「有訓練」的輸送華僑出國，創造對外滲

透的有利條件，才是「外鬆」和「紮根」的真正目的，一九七四年夏間，北平片面的破壞與英國的協議——原規定合法進入香港的移民每天限額一百人——，大量輸送華僑進入香港，最高紀錄每天超過六百人，引起香港政府的注意²²。這些執有香港政府合法簽證的「移民」，顯然不一定是屬於「五准」的僑眷，歸僑和僑生，其中不少壯丁年齡的青少年，大部份經由香港「合法的」或「非法的」轉往東南亞原僑居地，最近印尼政府追查中國「非法移民」，無疑的與一九七四年「大量輸出」有關連，中共要求僑眷出國「紮根」工作的陰謀，喬冠華曾公開聲稱：「我們必須教育中國的華僑、僑眷，到原僑居地要與當地人民羣衆打成一片……繼續『熱愛祖國』，繼續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繼續宣傳『毛澤東思想』，注意在不同的環境中，堅持不懈的生活、鬥爭、保存力量」²³。

(四)吸收華僑匯款為中共僑務工作最主要的目標，戰前僑匯為數達美金八千萬至一億元，為彌補中國國際收支重要來源，僑匯的用途在大陸淪陷前百分之八十四點五為贍家費用，餘者用於工商投資或其他用途²⁴。一九五〇年以後據北平「僑務報」透露，百分之九十以上為贍家僑匯，用於投資的僅百分之二，餘為其他用途²⁵。根據一九六七年合衆國際社的報導每年匯入大陸的僑匯平均將近八千萬美元²⁶。Prof. Jan. S. Prybyla 的估計每年約七千五百萬美元²⁷。本人曾從事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四年中共僑匯的估計²⁸，最後幾年每年不過四千五百萬美元，「文革」期間僑匯顯著的減少，每年不過二千萬美元，但一九七〇年以後僑匯數字逐漸回升。除了僑匯而外，中共對外貿易在華僑衆多地區需要借助華僑的力量，廣州「商展」和國外各地區的「商品展覽」，很顯然的政治的意義重於經濟的意義，說明白點不但是對海外華僑的經濟統戰，同時也是對第三世界的政治統戰。

註② Chun-hsi Wu, "Overseas Chinese," in *China Handbook* by Yuan-li Wu,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p. 421-422.

③ 莊克，「論僑農關係的性質及其演化」(北京，僑務報，第十期，一九五七年)，二至四頁。

④ 廖承志，「一九六四年春節對華僑廣播」，(北京，僑務報，第六期，一九六四年)，八頁。

⑤ Stephen Filtz 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A Study of*

①⑧ Chun-hsi Wu, "Overseas Chinese" *op. cit.*, p. 439.

①⑦ 中國自唐代以後，歷經宋、元、明至清中葉，政府對華僑採取鄙棄政策，實施「海禁」，限制華僑出入境，見華僑表總志，（臺北，海外出版社，民國四十五年），五一七至五二二頁。

①⑧ 馮志，「共匪放寬歸僑，僑眷與僑生出境限制之陰謀」，（臺北，匪情研究，第十六卷，第五期，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四八頁。

①⑨ Stephen Fitzgerald *op. cit.*, P. 180.

②⑩ 馬來西亞總理胡先翁表示，目前馬國境內二十萬華人，仍然處於「無國籍」狀態，（臺北，中央通訊社新加坡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五日航訊）。

②⑪ 喬冠華，見註⑨，四二頁。

②⑫ 民國六十四年六月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②⑬ 喬冠華，見註⑨，二二頁。

②⑭ Chun-hsi Wu, *op. cit.*, pp. 15-16.

②⑮ 僑務報，第二期，一九五七年二月號，北京，十頁。

②⑯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gives the following estimates (in million of U. S. dollars): 1950, 120; 1952, 148; 1959, 36; 1960, 52; and an average for the period 1961 to 1964 of 62. (UPI, Washington, March 8, 1967.)

②⑰ Jan S. Prybyla, "Communist China: The Economy and the Revolution,"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1968, p. 139.

②⑱ Chun-hsi Wu, *op. cit.*, Table 47, p. 142.

四 結論

「九大」以後，中共所謂一切為「革命利益」，貫徹「僑務服從外交」的基本政策，並無任何改變，而在策略運用上且儘量扣緊。雖然中共對海外華僑不斷困擾和增加壓力，妄圖操縱僑眾供其驅策，事實上多年來僑社所反映的厭共和反共的態度，證明中共的陰謀徒見心勞力絀，其原因：

一、傳統文化、經濟結構、社會組織為構成「華僑社會」的三大支柱，

現階段中共的華僑政策與僑務工作

蘇俄及其附庸

本書內容，主要包括「蘇俄歷史」，「蘇俄黨政現況」，「蘇俄外交」，「蘇俄文教現況」，「蘇俄經濟」，「蘇俄軍事」及「附庸國家概況」等七篇，均係當前國內第一流蘇俄問題專家集體著作，取材確實，立論嚴謹。二十四開本，計四一二面，平裝一冊，定價新台幣陸拾元整。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戰後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華僑遭受當地民族多方面的壓迫，正面臨傳統文化失調，經濟地位削弱，和社會組織解體的危機，唯一能够挽救這種趨勢，維繫華僑社會於不墜者，厥為傳統文化的精神力量。而中共的「僑務政策」却倒行逆施，企圖經由打破傳統來「改造」華僑社會，以便於操縱利用，自必為廣大僑眾所唾棄，此所以海外華僑的政治取向，歸趨於維護中華文化，爭自由爭民主與他們休戚與共的自由祖國。

二、華僑長久僑居國外，習慣於西方民主自由社會的生活方式，對於大陸共產社會制度的種種暴虐統治，深惡痛絕。特別是僑居東南亞的華僑，目睹本地區飽受共黨叛亂的禍害，身歷其境了解最深，絕非中共口蜜腹劍的統戰宣傳所能顛倒黑白，改變華僑反共的態度。

三、中國移民向外拓展，經濟為動因，文化為動力。由於年代久遠，根基漸固，華僑已視僑居國家為其第二故鄉，依靠民族文化，倫理觀念與祖國保持連繫，自大陸淪陷後，僑鄉已面目全非，連祖宗廬墓亦難保存，華僑深有後退無路容身無地之感，為求立足與世代生存計，自不能不處之謹慎，力求適應當地環境，決不願輕易介入任何政治活動，此為當前廣大僑家的共同心理狀態。中共為達成其政治滲透和武裝顛覆的陰謀，罔顧僑社的安全，策動僑社少數「親共」份子大肆活動，引起當地政府對全體僑家的注意與防惠，導致僑社的動盪不安。